

The Construction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Miss Kobayashi's Dragon Maid: "Atomized Individuals", "Heterogeneous Beings", and the "Mimetic Family"

Zhaoshuo Liu*

¹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nited Kingdom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zhaoshuo1997@outlook.com

Received: 2026-05-09 | Accepted: 2026-05-25 | Published: 2026-05-26

Abstract

Taking the anime Miss Kobayashi's Dragon Maid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s of novel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odern urbaniza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has dismantled 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lans, creating urban "atomized individuals" who are highly alienated by labor. Meanwhile, the "heterogeneous beings" (dragons) seeking identity in human society serve as a metaphor for groups that have lost their social belonging. Facing the survival pressures of modern cities and the weakening of traditional primary social groups, both parties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conventional blood ties and marriage through trauma complementation and emotional compensation, constructing a "mimetic family" based entirely on mutual selection. Although this quasi-family model exhibits a utopian fragility in the face of realistic economic costs and high social mobility (reflected in the "lifespan theory"), when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contemporary youth reshaping social connections and exploring new emotional sanctuaries as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evolve into the atomized stage.

本文以动漫作品《小林家的龙女仆》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现代城镇化与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型亲密关系的构建机制。研究指出，工业化进程瓦解了传统家庭与宗族，造就了被劳动高度异化的城市“原子化个体”，而剧中在人类社会寻找身份认同的“异类”（龙）则隐喻了失去社会归属的群体。面对现代都市的生存压力与传统初级社会群体的弱化，双方通过创伤互补与情感代偿，突破了传统血缘与婚姻的壁垒，构建出一种完全基于双向选择的“拟态家庭”。尽管这类家庭模式在现实的经济成本与社会高流动性（寿命论）面前呈现出乌托邦式的脆弱，但结合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它深刻映射了社会生产力演进至原子化阶段后，当代青年重塑社会连结、探索新型情感庇护所的必然发展趋势。

Keywords: *Mimetic family; Atomized individuals; Intimate relationships; Heterogeneous beings;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引言

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1]。这一点在日本动漫的发展变化上显现的其实十分明显。上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划时代作品《新世纪福音战士》将日本年轻人面对现状和未来的迷茫展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碇真嗣“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战斗，为了谁而努力”这一迷茫甚至仍是现阶段年轻一代必然面临的思考^[2]。年轻人身处在弥漫着迷茫与无助气氛的氛围中本能的希望得到安抚，一类名叫做「空气系（くうきけい）」的动漫作品由此开始人气渐高。因其剧情内容通常是年轻人日常生活，也被称为日常系^[3]。这类动漫作品风格多以喜剧为整体作品风格，作品主题包括但不限于家庭、恋爱、科幻^[4]。小森健太郎对日常系作品进行了综合特征的总结，其中一条是：“会描写主要角色的家庭，但不以家庭剧为主题”^[5]。

日常系动漫作品自诞生起其描绘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早期的日常系选择放弃上个世代作品对类似于“世界的终结与危机”等带有冷战色彩的宏大议题的思考，仅从日常琐事来推进剧情的发展。之后诞生的分支「新日常系」虽然依旧坚守着日常系“感受日常生活美好”的初心与主旨，但选择了通过描写日常生活被摧毁的惨状这一艺术形式实现痛感生活美好这一目标，《结城友奈是勇者》是这一系的代表作。而「なろう系」类的作品则是在日常系作品的结构框架基础上，结合了将类似于欧美中土世界的世界观的异世界观。

《小林家的龙女仆》（「小林さんちのメイドラゴン（Miss Kobayashi's Dragon Maid）」，下文简称《龙女仆》），包含了酷教信徒的原创漫画和基于漫画由京都动画进行动画化的动画作品。本文将通过这一作品，解析作品中这些特征背后映射的现实含义，并结合当下社会现状，构想未来城镇化社会新的亲密关系与人际社交的组建方式。

人：“原子化个体”的产生与发展

《龙女仆》中人类角色的人物特征对于经历过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的城市市民群体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小林是程序员，工作是坐在办公室编程，加班是个很常见的事情，喜欢女仆；泷谷也是程序员，只不过和小林不同的是，泷谷更喜欢游戏和动漫。这一形象很符合出生于 1980 年代后出生的群体，他们在童年时期接触到海外舶来文化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建立起相关爱好，在获得了高等教育之后在城市中获得了一份白领工作。这一群体的形象具有多个典型的特征：受过高等教育，学历一般是本科及以上；在城市定居方式为租房，居住面积较小或是与他人合租^[6, 7]；虽然所从事工作为上一代人所向往的行业（例如程序员、电台主持人、律师），但是角色仍是底层打工人。

日本“原子化个体”群体的形成是日本历史发展与变革中社会联结机制三次断裂的累积结果。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是一个与古代中国高度相似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生产与再生产单位，在此之上形成了基于共同水利、耕作与祭祀的村落共同体，以及由同姓同族构成的宗族网络^[8]。传统分散的农业生产中，一方面更多的成员是生产更多农业产品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环境为人类个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包括家庭、同辈群体、邻居、朋友、社会俱乐部在内的初级社会群体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有利条件下可以自发产生^[9]。这一时期，个体的身份与归属牢牢嵌入

“家”—村落这一双重结构中，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使得家庭规模较大，个体几乎不可能脱离共同体而独立生存。

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集中需求，从根本上动摇了农业社会的组织基础。由工厂主为主体的资产阶级在获取政治权力后，必定会推动作为小农经济生产主体的家庭和宗族的瓦解，以实现释放出自由劳动力并引导其进入集中化的工厂进行工业化生产。由此大量青年劳力离开农村，前往至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参与工厂、矿山与铁路等工业化生产以谋求更多的收入和更高质量的生

活。家庭在工业化生产中不再具有劳动力优势，与之相伴的，基于农业生产中的地理因素并在家庭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村落与宗族随之开始瓦解。在这一时期，尽管城市相较于农村存在人口密集更高、个人活动物理空间被压缩等不利因素，社会和文化惯性使得家庭在刚启动工业化的这一时期仍是城市中主流的社会结构。

二战后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模式。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高度成长期的推动下，大量农村人口继续涌入城市。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公司社会”为核心的稳定社会结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与企业福利住房制度共同构建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10]。对于家庭结构，核家庭化取代宗族大家庭成为主流，同时期的住宅政策鼓励自有住房的扩张则塑造了以“标准家庭生涯”，即结婚—生育—购房，为模板的社会主流的个体生活方式。尽管这一时期“原子化个体”仍没有在社会层面较为显著的发展，但传统宗族与村落共同体被瓦解、个体被嵌入公司与国家主导的纵向结构中、横向和自治的初级社会群体已大幅弱化^[11]。在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发展而日渐高昂的房价和房租造成了对于个体平均活动空间的限制，进而抑制了家庭这一结构单位在城市中的产生。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前，东京都市圈的房价收入比最高达到 18，去除税费大概在 12 左右。泡沫破灭后，东京都市圈房价收入比降到 11.4。日本每户人数在泡沫经济破裂前的 1980 年为 3.22，泡沫破裂后的 1990 年降为 2.99，2000 年为 2.78。被抑制的家庭生产进一步降低了源于家庭的新生儿数量，使得新一代的新生儿相较于上一辈在之后的童年阶段只能拥有更少的邻里同龄关系。这一现象是之后“原子化个体”爆发式的出现的必要条件。

1989 年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停滞期。企业大规模裁员、终身雇佣制瓦解、非正规就业激增^[10]。被称为“失落的一代”按照“标准家庭生涯”寻到一份稳定的全职工作和之后的结婚、购房、生育：东京单身家庭比例在 2000 年代已达 43%，年轻人群中推迟或放弃婚姻的比例逐年升高；更便宜的单间带厨房超小户型公寓所代表了物理居住空间原子化；生育率作为“标准家庭生涯”最后一环也显著的在逐渐降低^[12]。海量城市原子化个体由此在日本爆发式的产生，其典型特征为单身和小户型独居。

对比《龙女仆》中人类成年角色，即小林和泷谷，他们的背景经历符合这一进程的逻辑。一是两人在城市工作的小林和泷谷有着在非城市地区的老家但不经常回去，但仍保持着和老家父母的联系。在第一季第十一集中，小林通过托尔写新年贺卡联想到自己很久没有回老家过年，思绪片刻后接到了母亲的通话，表面仍在节日期间与老

家父母保持联系。二是他们在城市中自己独居于租赁的房间，且空间不大，不适合多人生活。第一季第三集在一开头就描绘了原本小林居住的公寓在托尔和康娜入住后变的拥挤不舒适，引出了之后搬去更大的租赁公寓的剧情。三是不再主动选择进入一段恋爱、婚姻关系。这一点虽然没有在剧情中主动说明，但是第一季第一集中配版这一男一女两人的对话以喜剧的方式反应了这一点：“（小林）约其他妹子不行嘛，非得找我。”“（泷谷）比起妹子还是和兄弟在一块儿更好啊！”“（小林，笑）你大爷。”

“原子化个体”的概念是以农业社会结构下的初级社会群体和工业化早期“标准家庭生涯”为基线提出来的概念。“原子化个体”的根本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与福利国家体制调整的产物：当企业与国家不再为个体提供贯穿一生的庇护，个体被迫“自由”地面对市场，原子化就成为结构性后果^[10]。因此当脱离了“生产、消费、税收”的结构框架时，个体在不被压制的结构框架中会自发的形成群体。二十一世纪以来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普及促进线上社群关系填补线下社群被压制产生的空白空间，“原子化个体”在这一环境下通过线上联结形成形成以亚文化认同为身份认知的群体。

在日本，包括漫画动画、电子游戏在内的“二次元”亚文化的发展与“原子化个体”的发展有着高度重合的时间线。「おたく」，也就是“御宅族”的概念最早见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最初指向热衷科幻与特摄的亚文化群体，带有强烈的“社会异质者”色彩，其原始用法即隐含了从主流社会退行、虚拟社群认领替代现实社交的潜质，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经济腾飞，工业产值增长如火如荼的时期^[13]。在《龙女仆》中，小林和泷谷的关系分为两条线：一条线是生产结构中的同事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两个“原子化个体”的工作独立性很高。而另一条线则是两个人拥有重合度很高的爱好，都是“二次元御宅族”。《龙女仆》中，对于两人第二种关系的描写幅度更大、内容更多。

龙：“异类”的身份认同

对于《龙女仆》中的非人类角色，每个角色在来到现代社会中之后都会经历对自己身份认同感质疑和思考的阶段。人类社会中的龙由于自身强大的实力和物种的不同，最开始的角色便是“异类”，不仅仅是异于渺小的人类，而且异于认为在人类世界生活是不能践行的禁忌的异世界龙。旧的身份认同不适用新的生活，新的身份认同尚未建立，便产生了对自身身份的质疑，不断“我是谁？我该怎么做？”的发问。而

本剧隐藏的主线剧情于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作为非人类生物，龙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会和人类社会中产生冲突；在之后的日常生活中，龙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角色，并遵循人类社会规则有了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交关系网。这一过程不仅是适应人类社会，更是在做出属于自身自我而非外界利益的选择、坚定的相信自身的选择，最后交出对于最开始疑问的让自己满意且无悔的答卷。

对于托尔，她在异世界的龙群中的意义与目标只有赢得与神的战争，在第一季第十二集中与流浪盗贼女孩的相遇和对话让她第一次开始思考为了自己生活是什么样的选择，但这一时期由于托尔之前没有接触过群体意义之外的认知，也没有产生对于自我主体的认知，便做出了独自向神族冲击的行为。被神族击败后逃到了人类社会所在的世界，相遇了小林。小林在酒醉状态发出“要来我家吗？”的邀请给了此时没有归属的托尔一个最简单没有利益目标的归属港湾，这也是托尔对小林产生爱意的开始：这是她自己邂逅的、不是由外界谁强制指定的归属，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一个她第一次自己做的选择。随后的对人类社会的学习和适应行为便是对由此起源的称为“小林的女仆”实质是小林伴侣的身份的强化与认同。对于其他龙也有着相似的“确立自我主体认知”的情节：康娜选择上学，成了才川的同学与好朋友；法夫纳仍然遵循本能选择了宅，但也突破过去自己选择开始信任人类。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这句提到的社会关系包括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当属于非人类生物的个体龙在人类社会中从事和人类一样的生产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有了和人类相似的社交关系网时，龙便成为了人。正如托尔因其“人类是低贱卑微的物种”的经典龙的认知而在最开始抗拒和人类接触，逐渐转变成认同相较于龙的渺小人类也能抱团创造美好生活的融入人类社会的一员，其本质原因和转变动力是托尔为了小林学会便接纳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从最开始的嘴巴喷火炸厨房、口嚼衣物进行清洁，到后期游刃有余的厨房料理、有条不紊的做家务，托尔的转变是《龙女仆》第一季剧情最主线的内容。龙，依然是异于人类的“异类”，但却也是有着和人类相同社会角色的“同类”。

“原子化个体与异类”之间亲密关系的构建

《龙女仆》中有两类现代亲密关系。一是“CP”，一种二人暧昧关系，包括小林与托尔、才川与康娜、泷谷与法夫纳、翔太与尔科亚、小健和依露露，这类关系是单独

个体与单独个体的亲密关系。二是“拟态家庭”，即小林、托尔和康娜的三人共同体，这类关系是并非基于婚姻和血缘构建的、与传统家庭不同的生活共同体。这两类亲密关系具有很明显的“承上启下”的属性：承上，即这类现代亲密关系诞生于仍有强大农业社会结构惯性的工业化现代社会，原有的婚姻家庭和宗族关系没有被完全解构并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因此即使不同，这类现代亲密关系仍倾向于模仿原有的亲密关系。启下，指的是这类现代亲密关系是对未知的未来后现代社会中主流亲密关系的探索，当传统关系被完全解构，所有人都成为原子化个体时，亲密关系会是什么形式？这是这类现代关系对自身进行审视回顾和总结复盘时没办法回避的问题。

第一类关系中，多组二人关系建立的动机基础在现实中十分常见：才川与康娜源于校园的同窗关系、泷谷与法夫纳是相同爱好的同好、小健和依露露是在相同工作场所工作的同事，校园、职场和亚文化圈因此也是新生恋爱关系所在的主要社交关系圈，这一点十分贴合现实生活。因此，在小林与托尔、翔太与尔科亚这两对并不依赖更大社交关系圈的亲密关系中，“原子化个体与异类”的属性更加显著和重要。

小林是原子化社畜，虽然生理性别是女性，但是在全剧中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中性甚至偏男性的着装，甚至会在工作后和泷谷喝酒时像一个大叔讨论女仆。如果说这种生活方式仅是生理性别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错位，那么以类似于小林的拒绝恋爱亲密关系、在工作场所穿着得体但独居空间凌乱为特征的女性群体，在日本社科研究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干物女（ひものおんな， Himono Onna）」^[45]。这一带有性别歧视的刻板印象名词背后反应的是日本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规训与束缚，社会对于女性的期望仅仅是婚姻与家庭关系中的“贤妻良母”，而干物女这一生活方式与选择可以看作是通过将自己原子化对抗这种规训与束缚^[45]。另一边，托尔与小林的境遇相似相异。托尔作为混沌派龙的领袖“终焉帝”的女儿，自出生以来如同嫡长子一样被父辈寄予继承父辈事业的期望，剧情中也就是领导混沌派龙同调和派龙与神族进行并赢得战争。这种被群体给予特定社会角色与寄予特定期望的境遇与小林遇到的日本女性境遇相似。相似处境下的托尔选择了与小林不同类型的方式进行抵抗。从第一季后期剧情中小林以不直接的委婉方式接受了托尔的爱意可以看出，小林并非没有情感需求，只是在选择将自己原子化进行抵抗的同时主动压制和隐藏了这部分需求，是一种向内的、舍弃自我的抵抗。而托尔面对相似规训境遇时，选择了向外的、坚定自我的抵抗方式：在第一季第十三集中，面对父亲试图将她强制压制在规训内的行为，已经找回自我的托尔选择直接面对父权并进行高烈度的对抗。于是，在《龙女仆》动画使用了

整整一季的长度描绘了小林与托尔的人物背景和互相改变彼此的成长经历后，在第一季结尾，给出了“原子化个体与异类”之间成功建立亲密关系并相互救赎的结局：习惯向内的“原子化个体”小林选择向外给了托尔容身之所与对托尔自我的肯定，习惯向外改变外界的“异类”托尔选择向内改变自我适应人类的生活。

这一类关系虽然表面主题是两个个体的亲密关系，本质主题则是“自由、反抗、救赎”。因此作者酷教信者在构建小林—托尔关系时选择了两位女性，这一性别设定的效果是排除了传统异性婚姻所携带的妥协与规训意味和男女关系带有的性色彩。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选择两位女性构建这一关系，并非偶然，而是延续了日本文艺中“百合文化”对传统异性恋范式的抵抗。对日本文艺作品的这一“百合文化”进行溯源，这一现象并非诞生于最近三十年。1914 年日本妇运先驱之一尾竹一枝在《青鞥》上发表了小说《C 的竞争者》，描述了女性间的倾慕与爱恋不被传统社会异性恋范式所解释和理解^[16]。二战后 1976 年集英社建立 Cobalt 文库之后，面向女性尤其是少女群体的文库本“百合”轻小说才以文库本的形式又慢慢回到公众视野当中。

翔太与尔科亚这一对关系与托尔与小林相似，但又有显著且微妙的不同。翔太的处境与托尔相似，出生于魔法师世家但生活在人类社会的翔太为自己出生在魔法使家族而自豪，但同时也承受着“必须成为独当一面的大魔法使”的巨大压力，渴望成长、渴望被认可为“合格的大人”，总是急于想要证明自己，在这种内生的自我压力下，翔太催促自己在不依赖外界帮助下成为魔法师家庭中能够独当一面的独立个体。在第一季第六集中，翔太承认了画魔法阵召唤自己的原因就是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明确拒绝了尔科亚提供的金钱、知识和领导力，渴望独立并急于自身能力的人设由此立了起来，同时这一份也使得翔太被对自我的严格要求隔离于其他人，尤其是身边的尔科亚，成为“原子化个体”。而尔科亚和托尔类似的情况是她也是没有归属的个体，喝醉酒之后犯错、离开原来的魔法世界是尔科亚失去归属的重要两个原因。而在第二季，尔科亚主动向翔太袒露心声，交代了自己最大的弱点：“其实我心里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失去归属哦。”一人一龙于是也产生了互补的关系：翔太需要魔法能力的成长，尔科亚提供魔法学习的引导与指教；尔科亚需要一个归属，翔太的需求给了尔科亚一个容身的位置。但相较于小林与托尔在第一季中丰富的矛盾、信任、理解与成长的描写，翔太与尔科亚由于其在剧情中非第一梯队主角的定位与人设拥有的人物和关系的刻画较少，人物之间的关系在有着完整框架的同时没有小林与托尔的关系深刻。

进阶亲密关系的“拟态家庭”

与单个个体与单个个体的一人一龙的关系相比，“拟态家庭”的群体关系更复杂，所需描写也更多，因此整个《龙女仆》作品中，类似的关系仅有小林—托尔—康娜构成的“拟态家庭”这一案例。在这一案例中，小林扮演父亲、托尔扮演母亲、康娜扮演女儿。

在现有的研究中，与《龙女仆》的“拟态家庭”相似的关系有多种。虚拟亲属关系（Fictive kinship）是既非基于血缘关系也非基于婚姻亲密关系的亲属或社会联系形式^[17, 18]。虚拟亲属关系可以分为在离散情境中出现的情景亲属、作为习俗一部分出现的仪式亲属和源自选择和意图的有意亲属^[19]。这其中仅有有意亲属是基于自由选择的关系：情境亲属关系中，便利亲属局限于极端边缘幻境，具有福利救助性质；制度亲属基于像是监狱、养老院等的机构基础的制度化群体关系；组织亲属存在于宗教与志愿团体，特征为成员有群体义务；照护亲属则是有偿照护中的关系。仪式亲属仅存在特定文化关系中^[19]。《龙女仆》的“拟态家庭”与对小林和托尔的关系描写类似的将关系设定在三位女性之间，具有强烈的有意亲属色彩：托尔和康娜先后主动选择小林，小林愿意接受两条龙。按照剧情顺序，这段家庭的构成始于托尔成为小林的女仆，形成阶段结束于康娜获得小学生这一社会角色，此后的剧情都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发展。回顾人物关系建立的基础，除了上文提到过的小林—托尔一人一龙的关系建立，小林—康娜的“监护人—被监护人”的拟亲子关系是“拟定家庭”关系的另一支柱。这一“拟态家庭”的独特性在于，其建立的情感需求基础是非传统式的，但最后形成了类似传统家庭式的婚姻—亲子关系复合体。与有意亲属不同的是，外界压力因素对于“拟态家庭”的建立是必要且重要的。有意亲属存在成员均在正常成长和家庭环境下做出的主观选择，而回顾“拟态家庭”的建立，托尔和康娜的生长和家庭背景是推动她们选择小林的主要推力。尤其是康娜主动选择成为“被监护人”的行为，是有意亲属关系中少见的。

回顾小林与康娜关系建立的过程，对康娜的家庭背景的了解是必要且重要的。在动画第一季第九集，托尔有如下的台词：“康娜的父母基本上都不管她的，他们认为龙要独立才会强大。他们教导康娜，既然取了康纳卡姆依这个名字，就必须坚强的活下去。康娜不断地搞恶作剧，其实是为了吸引父母的注意，结果却被放逐到这个世界来。正因为这样，她才会对小林撒娇吧。”总结起来，仍处于童年阶段的康娜是缺少

父母爱意与关注的，而已经是成人阶段的小林也在这一集介绍自己成长阶段面临同样情况时只能选择接受现实和学会理解父母。于是，小林对康娜的感情包含了第一季第二集中表现出的社会结构中长辈对晚辈天然的关照与爱，也包含了第一季第九集中更详细了解康娜家庭背景后产生的共鸣和恻隐之心。接受自己康娜监护人的身份，对于小林自己，既是在守护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成年的小林通过建立美满“拟态家庭”关系拯救成长阶段缺失这部分带有遗憾的自己。于是我们在这个“拟态家庭”中看到了相较于现代社会中主流话语中家庭诞生于父母爱情与繁衍后代的动力不同的构成基础——创伤互补与情感代偿。值得提到的一点是，《龙女仆》中“拟态家庭”具有很强烈的“纯粹”氛围：作者将所有家庭成员都设定为女性；个体分属不同物种；已有主动加入的个体扮演“孩子”角色。这样的设定有效的避开了读者在提到“家庭”时联想到传统家庭中“繁衍”与“生育”的功能，隐晦的突出作品主题之一的“自由意愿”。

“拟态家庭”在剥离传统婚姻基础因素的经济要素和繁育功能后，对于每个成员，“拟态家庭”存在的意义是填补未被满足的亲情类型亲密关系的需求。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将年轻人从故乡连根拔起，塞进都市的格子间里。即使原生家庭再温暖，地理距离放大的代际隔阂使得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本能地需要在物理距离上足够近的生活圈中建立高浓度的亲密关系。高压工作环境、高昂生活成本以及突发危机的脆弱则强化了城市原子化个体寻求近距离亲密关系的意愿。如果说历史的惯性使得传统家庭关系仍具有活力，那么促进个体突破传统家庭的因素则会如催化剂一样加强个体选择“拟态家庭”的意愿。

乌托邦的脆弱与现实启示

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所反映的只是特定角度观察到的社会现实的映射，而非复杂的社会显示本身。而残酷的社会规律使得不脱离现实的优秀文艺作品在像童话一样所构建的乌托邦最终还是会走向消亡。当构建关系的基础要素消失后关系也将随之消散。

托尔和法夫纳在面对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时，自愿的选择改变自身行为和思考模式以建立符合外界社会规则的身份以解决危机。然而这一基础是：托尔和法夫纳身为龙，面对人类社会时拥有自身能力的绝对且巨大的优势，这使得他们在面对身份认同危机时，可以基于自身意愿选择改变自身的同时也可以选择改变环境。试想如果托尔

和法夫纳只是普通人类，大概率会失去做出改变环境的选项时，在面对建立身份认同和保持自我主体性的矛盾时，理想未来是否存在？在日本，霸凌是存在于校园的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保持自我个性并异于群体，进而面对遭受群体在身体和精神上报复式的霸凌时，普通人因为没有改变群体的能力，在存在不想改变自我本性的本能意愿和霸凌带来的痛苦时，身份认同问题便是一个个体角度看起来无解的问题。

《龙女仆》的结局是塑造作品内外角色与读者观众共同思考和忧虑的剧情推动者，影响结局的因素中有的被克服消除掉，例如面对打破原有异世界规则束缚带来的惩罚时，托尔和小林因双向奔赴的决心赢得了扭转局面的机会；而也有像达摩克里斯之剑悬于角色和观众思绪之上的，“寿命论”，即长生能活数千年的龙很快会面对短生只能活一百多年的人类伴侣的死亡，托尔在面对这一阴霾时最后做出决心珍惜当下。这些被消除掉的因素有着共同点：主观选择是决定性因素。因此现实中基于文化认同建立起来的关系相较于基于生产的关系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更加脆弱：毕竟主观意愿相较于客观因素更不稳定。

在《龙女仆》中经济因素一直是被忽略的重要因素。小林的收入能够支持“拟态家庭”日常开销的同时更换更大面积的租房。动漫作品作为“避风港”，通过赋予主角理想化的经济能力，掩盖了现代都市建立新型亲密关系的高昂成本，实现作品通过鼓舞人心来获取高关注和高阅读量的目标。也因此，“拟态家庭”在现阶段仍带有极强的乌托邦色彩。

结论

综上所述，《龙女仆》绝非仅仅是一部披着奇幻外衣的日常喜剧，它是现代都市社会结构变迁的一面镜子。当传统初级社会群体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中逐渐瓦解，无数被迫剥离故土的“原子化个体”与在现代规则中迷失自我的“异类”，在基于相似相异的个体背景重构亲密关系含义，也在通过一种打破血缘与婚姻壁垒的“拟态家庭”模式，重新寻求更加兼容现代社会规则和保证个体利益的群体关系。虽然这种完全基于情感契约与功能互补的选择性家庭，仍面临着经济基础的考验与现代社会高流动性的撕扯，但它无疑为未来城镇化社会提供了一种极具生命力的人际交往构想。在未来，家庭的定义或许将被进一步拓宽，不再仅仅是由基因与契约捆绑的生育单位，而是如小林、托尔与康娜那般，在冷漠的钢铁森林中，两个或多个孤独灵魂基于双向奔赴的选择与救赎，所共同筑起的、能够安心互道一句“我回来了”的避风港。

这一趋势绝非纯粹的文艺幻想，而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揭示的那样，家庭始终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范畴，社会结构注定要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从氏族公社时代的血缘家族，到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传统专偶制家庭，家庭的组织形式始终在不断适应着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20]。当现代高度发达的工业与数字经济重塑了人们的劳动模式，将个体从传统的乡土宗族中彻底剥离出来时，旧有的家庭结构必然面临解构。在这个意义上，《小林家的龙女仆》中所呈现的“拟态家庭”，不仅是对当代都市青年精神孤岛的温柔抚慰，更是生产力演进到原子化阶段后，人类在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与社会连结时，所留下的一抹深刻的时代倒影。

Declarations

Data Availability Statemen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media works cited in the References secti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specific grant from any funding agency.

AI Assistance Disclosure

No AI tools were used in this research.

Reference

- [1]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2] 侯达任, 田明星. 日本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的角色塑造与精神外化[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8): 132-135.
- [3] 前島賢. セカイ系とは何か ポスト・エヴァのオタク史[M]. 初版. 東京: ソフトバンククリエイティブ, 2010.
- [4] Brenner R E. Understanding manga and anime[M]. Westport, CT : Libraries Unlimited, 2007.

- [5] 小森健太郎. 神、さもなくば残念。——2000年代アニメ思想批評[M]. 作品社, 2013.
- [6] 赵卫华. 居住压力与居留意愿——基于北京外地户籍大学毕业生的调研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8(02): 31-40.
- [7] 李晓红. “北漂”：租房比买房划算，期待租购同权[N]. 中国经济时报, 2023-04-18: 004.
- [8] 柳田國男. 明治大正史 世相篇 新装版: 世相篇[M]. Tōkyō: 講談社, 1993.
- [9] 田毅鹏. 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J]. 社会科学, 2009(07): 71-75+189.
- [10] Ronald R. ATOMIZING THE URBAN: SOCIAL CHANGE, SINGLE HOUSEHOLDS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S IN TOKYO[C]//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Urbanism ‘the New Urban Question-Urbanism beyond Neo-liberalism’. 2009: 311-322.
- [11] 六郎田渕. The Japanese Family System in Transition: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Family Change in Postwar Japan. By Emiko Ochiai[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2004, 13: 134-138.
- [12] Matsukura R, Retherford R D, Ogawa N. Declining fertility in Japan: Its mechanisms and policy responses[J].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2007, 22(2): 33-50.
- [13] 東浩紀, 王飞. 动物化的后现代: 从御宅族透析消费社会[M]. 褚炫初, 译. 第一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
- [14]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人民出版社, 1956.
- [15] Fisker-Nielsen A M. ‘Genderism vs. Humanism’: The Generational Shift and Push for Implementing Gender Equality within Soka Gakkai-Japan[J]. Religions, 2022, 13(5).
- [16] 赤枝香奈子. 女同士の親密な関係にみるロマンティック・ラブの実践[J]. 社会学評論, 2005, 56: 129-146.
- [17] Déchaux J H. Kinship Studies: Neoclassicism and New Wave :A Critical Review[J].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006, 47(3): 591-620.
- [18] Kemp J H. Kinship and the Management of Personal Relations: Kin Terminologies and the “Axiom of Amity”[J].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1983, 139(1): 81-98.

[19] Nelson M K. Fictive Kin, Families We Choose, and Voluntary Kin: What Does the Discourse Tell Us?[J].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2013, 5(4): 259-281.

[20]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Journal Disclaimer

The views, opinions, and conclusions expressed in this article are solely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ACGN Nexus, SciHorizon Global LLC or the editorial team. Publication does not imply endorsement of the content by the journal or publisher.

While we strive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published content through our editorial and community review process, ACGN Nexus and SciHorizon Global LLC make no representations or warranties regarding the completeness, accuracy, or suitability of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article. Readers who apply methods, protocols, or findings from this article do so at their own risk.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SciHorizon Global LLC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author(s) and source are credited.